

Satir溝通姿態之反思暨 台灣人人際溝通量表之修訂

顏欣怡 卓紋君

研究目的：本研究植基於考量兼具中華文化傳承與西化影響下台灣人的溝通特性，審視Satir的溝通姿態內涵，並且據以修訂人際溝通量表。**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網路調查20歲以上之台灣民眾，回收516份問卷，有效問卷413份，比率为80.03%。**研究結果：**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直交轉軸最大變異法)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人際溝通有九種，分別為討好、忍讓、指責護顏、重理、證己、打岔、迂迴、一致、圓融；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5.074%。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06，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介於.674到.874。該量表亦具合理的效標關聯效度，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適配指標值大多達可接受的標準。**研究結論：**本研究所修訂之人際溝通姿態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與效度，有助於了解與探索台灣人在一般人際互動的特性。此外，直接套用Satir模式的五種溝通來瞭解台灣人的溝通是不足的；九種溝通型態除指責護顏外，其他八種均出現類似雙元的溝通現象，亦即有類似西方的一致和不一致溝通，以及其所對應的華人文化特性的溝通內涵。

關鍵詞：Satir、溝通姿態、人際溝通量表

顏欣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耕心療癒診所諮商心理師；研究興趣為人際溝通、愛情與婚姻關係。

卓紋君：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教授；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育心理哲學博士；研究興趣為完形治療、愛情與親密關係、家庭與婚姻諮商、團體諮商諮商與心理治療、諮商實務與督導。

(通訊作者；E-mail: wccho@ncku.edu.tw)

收稿：2019年12月12日；接受：2020年5月10日

一、緒 論

人的一生與溝通脫不了關係，從嬰兒的牙牙學語，運用表情、手勢和語調傳達訊息；直到成人，透過口語和非口語與人互動、形塑關係，甚至發展出各自特有的溝通模式，形成個人性格的一部分。談到溝通，自然會想到經驗人本取向的家族治療大師Virginia Satir。1982年Satir初次來台帶領家族治療工作坊(Chao, 2011)，她的充分臨在(being present)、開放真誠和關懷接納，以及特有的治療風格，在台灣吸引許多後進效學，成長和專訓的工作坊持續地進行著。其所開展出的理論及做法，一般稱為薩提爾模式(Satir model)(Banmen & Maki-Banmen, 2014)。溝通姿態(communication stances)即是該模式中一個關鍵、且可供覺察與轉化的重要介入。由於Satir(1983)深信溝通是決定個人與他人關係的最大因素，她提出了五種溝通姿態，包括了一致和四種不一致的溝通姿態。其溝通姿態不但被直接應用於諮商實務之中，也有據以發展出量表或進行介入成效的研究等。

研究者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和「華藝線上圖書館」等系統，以「溝通姿態」、「薩提爾」、「薩堤爾」為關鍵字詞，在2019年5月進行初步的資料檢索，共得到23筆碩士論文及17筆期刊論文；後來發現有3筆期刊論文為碩士論文改寫發表，故予以刪除。分析筆數從1998到2019年有20筆碩士論文(54%)及17筆期刊論文(46%)，共37筆資料。其中，從2001年開始每年至少都有一篇與Satir相關的實徵研究產出，且2000年和2013年甚至高達5篇；顯示Satir模式一直是學者重視的研究主題。

研究者整理前述跟溝通姿態量表編製有關的六篇論文，包含：王嘉琪(2013)；卓紋君、簡文英(2003)；陳奕吟、卓紋君(2017)；陳奕良(2001)；盧宜蔓(2009)；顏欣怡、卓紋君(2013)，發現其皆傾向直接套用Satir的概念而發展出溝通姿態量表。然而其能否如實反映台灣人的溝通特性，仍需接受檢視。這6篇研究中以修編量表為多，其中只有最早發表的陳奕良(2001)係自行編訂溝通量表，可說是後來其他研究者應用Satir溝通姿態的初始根本。陳奕良在當時國內外缺乏以Satir為依據而編擬伴侶溝通量表的情況下，使用Satir理論，並參考其他測量工具，作為「伴侶溝通量表」發展的基礎。她所參考的相關工具包括：Liu於1993年所編的「夫妻衝突量表」、Willett於

1996年所編的「關係技巧檢核表」、邱秀貞於1987年所編的「夫妻溝通量表」等等。陳奕良再請專家學者審訂題目，之後進行因素分析而形成情侶版的溝通量表。

接著，卓紋君、簡文英(2003)以陳奕良(2001)的伴侶溝通量表為本，也參考了Satir和Baldwin(見李瑞玲、黃繡、龔嫻紅譯，2000/2001)、Bozeman(1985)、Satir等人(見林沈明瑩、陳登義、楊蓓譯，1991/1998)對溝通姿態的論述，編製了「父母溝通姿態量表」。盧宜蔓(2009)根據陳奕良(2001)的溝通量表、卓紋君與簡文英(2003)的「父母溝通姿態量表」、Lee(2002a)的「一致性量表」，以及溝通姿態的理論編擬大學生版的量表。她也邀請學者、具多年Satir實務工作經驗者，及統計專家等三人，共同協助評定此「人際溝通量表」之專家效度；最後修改成35題的版本。前述學者編製量表的過程可謂嚴謹，然而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直接套用國外理論和相關量表，缺少對於本土文化的回顧，以及檢視東西方在人際互動上的本質差異；這些量表編製研究屬於楊國樞(2008)所言的外衍性本土化研究。

後續大部分的研究或直接採用盧宜蔓(2009)所提出的「人際溝通量表」(如王嘉琪，2013)；或是據以進行編修，如顏欣怡和卓紋君(2013)修改成25題的版本；陳奕吟和卓紋君(2017)則修改成22題的版本。溝通姿態的題項係透過重複的研究，據以發展出針對不同族群的量表，而目前最精簡且為共同題項的版本是陳奕吟和卓紋君的22題。上述研究雖經過因素分析的檢驗，其是否貼近本土台灣人溝通的特性以及適用性，仍值得斟酌。

Brindley(1990)指出台灣人在保有傳統文化價值(如孝道和人際和諧)之外，同時也受到西方影響，強調獨立自主的思維也趨向普及化。承此，陸洛和楊國樞提出「雙文化的自我」(bicultural self)觀點，認為台灣人具有承襲自傳統文化的社會自我，以及西化之下的獨立自我(Lu & Yang, 2006)。夏允中、劉淑慧、王智弘、孫頌賢(2018)認為西方一神文化形成了個人主義的世界觀，而華人的儒釋道文化強調自性的覺醒，則形成了重視個人修煉及人境和諧的世界觀。可見台灣人的溝通方式可能表面與西方文化的溝通姿態相似，其背後真正的想法感受可能仍受華人文化影響，而和Satir溝通內涵有所不同。

誠如楊國樞(1993a)於開創本土心理學研究時指出，在任何社會中從事當地民眾的心理與行為研究，都應該具有足夠的本土契合性；而對以往思想傳統的承接、本

airiti

土性研究文獻的探討以及探索性實徵研究的從事，均有助於本土契合性的促成(黃曬莉，2008)。因此，本文基於Satir模式在諮商領域的普及性，選擇聚焦於Satir溝通姿態的論述和本土文化下人際互動的特性，持反思的態度，重新檢視與編擬溝通姿態量表並進行分析；藉以發展出適用於台灣華人關係的溝通姿態量表，供後續研究參考與實務應用。

本研究聚焦於Satir模式的溝通理論，下文先簡要介紹Satir溝通姿態的內涵，搭配本土文化下溝通意涵的省思，進行對照和論述。

(一) Satir模式的溝通

Satir認為個體的普遍渴望和目標是生存、成長以及跟他人親近(吳就君譯，1983/2006)，而溝通就是管道與方法。她視兩個或多個人之間的溝通為互動，在任何互動中都含有三個部分：自我、他人和情境；這三個組成部分就是「生存(應對)姿態」(Innes, 2002)。自我價值感低落的人會採取各種生存策略，包括指責、討好、超理性和打岔的應對姿態；這雖然是兒童時期就發展出來的，但並非固定不變。雖然大多數人在壓力下都有一個主要使用的對應姿態，許多人發現自己會根據他們的情境和關係使用應對姿態(Banmen, 2002)。在Satir的論述中，生存姿態和溝通姿態(Communication Stances)經常互換使用，反映的是人際之間的溝通模式(林沈明瑩等譯，1991/1998)。

1. Satir模式的一致溝通

Lee(2002b)指出一致(congruence)是Satir模式治療性改變的目標。Satir認為的一致是指，個人可以知覺到自己的狀態、觀察他人的狀況並掌握整個情境，具有確實表達出個我內在感受與思考的自由，重視個人的獨特性與差異性，是一個高自我價值的表現，而且是最直接而真誠的溝通方式(吳就君譯，1983/2006)。所謂一致，並不是要求一個人表達每一種感覺或想法；而是一個人根據自我、他人和背景的需要，有意識地選擇表達什麼(Smith, 2002)。其特徵如下：欣賞自己的獨特、能量可在個人與人際間自由流動、願意信任自己及他人、願意冒險面對改變、允許脆弱、善用自己的內外在資源、開放自己建立親密感、愛自己也愛別人，以及面對改變時能

彈性且開放(林沈明瑩等譯, 1991/1998)。王行(2016)體會到一致性溝通的意義, 在於覺察自我內在心理歷程的狀態, 如感受、思考、欲望、情緒, 甚至自我防衛等, 並且以「我訊息」(I messages)的語句形式表達給他者。

Satir對於一致的看法, 歷經三次的變革(林沈明瑩等譯, 1991/1998)。在1950年代, 一致意指覺察、認識和接納自己的情緒感受, 以及用非即時反應(non-reactive)的方式來表達情感。到1960年代, 一致被視為一種個人整體且有自我核心(self-centeredness)的狀態, 並且和高自尊有密切關聯。此第二層次的一致溝通雖然焦點仍在自己, 但反映的是人們可以和自己、其他人以及環境脈絡和平且和諧的相處。到1980年代, 一致的第三個層次跟靈性以及宇宙一種生命的力量有所連結; 這股能量可以創造、支持、療癒和促進成長。第三層次的一致是指人可以成為全人(totally human), 代表個人自我、生命能量、靈性(或是上帝)等各層面的和諧。簡言之, 一致涵蓋三個面向, 包括個人內在(冰山的隱喻), 展現在溝通互動上的人際層面, 以及宇宙靈性的層面。第二層次為和諧相處的看重, 呼應華人重視關係的特質。而從成為完整的人類來說, 第三層次的一致和華人文化講究的天人合一也有相似之處。因此, Cheung和Chan(2002)討論Satir模式應用於華人講究階層的集體文化時, 即提到從人際和全宇宙的層面下手, 對於華人個案比較沒有違和感。

一致的溝通可以化解衝突並創造良好的互動經驗, 重視關係的華人文化也有與其類似但不盡相同的概念。陳秉華(2001)指出, 處於現代華人社會的人際適應要有一種能夠不斷在人我的關係中進行協調的能力; 亦即個體能夠經常地、有意識地、有目的地, 以私下或是公開的思考或行動, 在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作協調, 不僅達成自我的目標, 也能獲得人際的和諧。這樣的溝通反映了楊國樞(2004)所謂的關係中的自我特性; 華人在人際溝通之中, 除了追求自我意識和主張之際, 也有連結性的需要(劉惠琴, 2005)。這是個人一種有動機性的, 也是不斷在人我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的心理社會能力。它的功能是使個人能夠滿足自我的需要, 也能夠同時照顧到社會關係中他人的需要, 而使個體達到兼顧自我以及維持社會和諧的目標。這反映出具有高自尊的本質, 且忠於自我並顧及旁人的特質。

類似於此的亦有黃曬莉(2006)提出的「協調」, 是中國人處理衝突時對於雙方皆有利的「雙贏」方式, 也是最具建設性的方法; 主要分為三種: 相濟相乘、折衷

airiti

妥協和協商談判。張包意琴和陳麗雲(2000)也提及：華人認為「家和萬事興，和氣生財」，此中涉及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係。這種在意雙方各自的價值，於意見不同時，仍願意彼此理解協調，並作彈性的改變，以達到折衷妥協或協商雙贏的情況，頗似Satir一致的溝通概念。

此外，華人文化中的「誠」是一種講究真誠覺察自我的修養態度，它與「一致型溝通」的理想精神有所呼應，但又不全然相同。王行(2016)認為《中庸》所論及的「誠」即是面對道德本體的真，同時也包含了將此道德本體表現於外的「一致性」，也就是「誠於中、形於外」的意思；而此亦相應於Satir所提出的「一致性溝通」。但是，《中庸》所論及的「誠」不只是說出真心話的勇氣，也不只是覺察內在心理經驗，而是「修養」上的功夫(楊中芳，1999；王行，2016)。換言之，王行認為「一致性溝通」即是奠基於真誠一致的存養功夫，此功夫是在日常生活的人倫瑣事中自覺、反省與實踐之活動。正如黃光國(2010)所認為的「修養」，並不僅只是在個人成長的社會化過程中，要展現出真實的自我，還要善盡個人對於重要他人的「義務」。由於個人不能脫離各種關係而獨存，人們會因與不同對象和關係而展現不同的溝通方式；此即符合儒家文化中重要人際關係理論的「五倫思想」，也符合儒家講求仁愛是有遠近、親疏之別的概念(黃光國，2017)。因此，運用在溝通姿態時，華人面對親疏、遠近之分的人際關係，可能有不一樣的展現；在家重視家庭，工作便重視團隊關係，交友就重視內團體成員的依賴。華人在人際處理上更重視整體關係的維護，這跟西方社會的契約式關係亦不盡相同。這是一種修養與誠的實踐。

綜合上述，Satir的「一致」展現在以儒家為文化底蘊的華人社會中，是一種「最適自我」，也是一種「倫理自我」；而一個人必須具有「反求諸己」的修養，能夠善盡個人對於他人的角色義務，才能夠達到「最適自我」的狀態(黃光國，2010)。循此，Satir中的「一致」，對具有文化傳承與現代的台灣人而言，可能有雙重的意義。其一為西潮影響下的個我，期許內外一致，真實做自己，並達到人我兼顧的一致；其二為傳統文化脈絡下，展現在人際互動中的一種自我要求與修養，也就是反求諸己的一致，是經過考量人事物與克制之下的修為，因此以「一致圓融」稱之，或許更貼近華人考量他人、情境與自己的特性(如表1)。這兩種一致的溝通姿態，於理應該屬於高自尊者的表現。

表1 台灣人的溝通姿態與意涵

Satir	台灣人的溝通姿態				華人觀點 Satir
	意涵一	意涵二			
討好	弱勢的討好	1.被壓迫的犧牲委屈 2.面對威權的慣性反應	顧及關係的討好	1.為了關係的打圓場 2.以和為貴 3.陽奉陰違	討好忍讓
指責	威權的指責	1.階層觀念下遂行己意 2.彰顯己志的理所當然	維護顏面的指責	1.在乎他人眼光 2.維護自身面子尊嚴	指責護顏
超理智	唯理至上的超理智	1.以理服人 2.據理力爭	證明自己的超理智	1.彰顯面子 2.證明能耐	重理證己
打岔	逃避的打岔	1.心不在焉 2.消極抵制 3.隔離棄守	事緩則圓的打岔	1.內心穩定 2.迂迴表達 3.急事緩辦	打岔迂迴
一致	人我兼顧的一致	1.忠於自我並顧及旁人 2.具高自尊	反求諸己的一致	1.折衷妥協 2.協商雙贏 3.修養(誠)實踐	一致圓融

2. Satir模式中不一致的溝通

不一致指的是外在行為和其底層的內在歷程不吻合或產生衝突(江麗美、魯宓(譯)，2006/2008)，尤其對威脅或壓力產生反應時常常因為要保護自尊而採取的求生存方式。下文根據Maria Gomori對這些溝通姿態的說明(易之新譯，2008/2009)逐一簡介，之後為含攝文化的評論。

(1)討好的姿態(placating)

討好者重視的是他人，會試著取悅別人或者常常道歉，內心會覺得自己沒有一點價值。此乃源於討好者認為對方比較重要，自己必須照著對方的要求做，不然就會被拋棄，因為自己不值得被愛。其內在語言是「好，我同意」、「你永遠是對

的」、「你一直是知道最多的人」。這是一種弱勢的表現，可能是被壓迫而產生的犧牲委屈，也可能是面對權威的慣性反應。

華人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類似的討好型溝通方式，但在內在機制或動機可能有所不同；由於華人傾向以關係和諧為考量，因此可能出現為了關係而打圓場的討好行為。陳秉華(2001)指出面對權威關係，受到傳統順從與維繫關係和諧的價值觀影響，使得位階較低的人，必須學會抑制或是隱藏個人的喜好或是意見，盡量表現出與他人相似的行為，以便被接納、肯定。張包意琴和陳麗雲(2000)認為中國人主張「以和為貴」，但在「權威集體主義」的文化處境中，「和」的實踐極易變成運用權威來保持現狀，要求個人安份守己、言行不逾矩，「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扭曲個人意志。這一種被壓迫式和委屈小我的討好，和Satir所闡述的討好型較為接近；而且也屬於低自尊的表現。

此外，Gao(1998)認為中國人的自我建立是互賴的，自我對他人的行動傾向是根據外在期望或社會規範而來，並非由內在期望或人格特質所完成；個人若要成為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則必須致力於他自己的「社會自我」，使其發揮功能。換言之，自我的存在是一種估量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傾向後，決定在獨特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吳峻安，2003)。據此，有一些在傳統價值觀下成長的人，既認同維繫人際和諧的重要性，但私底下也希望能夠滿足自己的需要與實踐自己的主張；他們往往會做出一些人前人後、表裡不一致的行為反應(陳秉華，2001)。黃囍莉(2006)根據己方的利益或意見，以及對方的利益或意見，將衝突化解方式分為四個象限，分別是協調、抗爭、退避、與忍讓。黃囍莉(2006)提出的忍讓，其基本心態也是以對方為重，調整自己，順應他人的作法；其中順勢迂迴即為一種「以退為進」或「以柔克剛」的忍讓，是有其目標的。這種退讓以大局為重，表面與原來Satir的討好概念類似，內在的狀態卻又不盡相同，反而接近「一致」的修養。這種面對衝突之際，傾向顧慮他人反應以及在乎人我關係之下的順從與犧牲，看似是忍讓，但也很可能出現陽奉陰違的情況。出現這種看似討好的台灣人，可能類似Satir所認為的低自尊，但也可能是具有相當穩定的內在力量，才能面對人我不一致但又清楚要如何與他人應對的行為表現。簡言之，華人傾向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調整自己的行為表現，並

且以維繫良好關係為重要考量；即使別人跟自己內心的看法迥異，但是外顯的互動仍可能採取迎合的態度，以減少不合或衝突。這種情況下，很容易當下表現出類似討好的姿態，但就長遠來說，不見得是委屈或犧牲。這樣的動機是可能是顧及關係產生的忍讓，並非自認弱勢而投降，亦非低自尊的狀態。因此，就華人文化來說，討好的意涵是同時具有弱勢的討好和顧及關係的討好，此兩個面向擬以「討好忍讓」稱之。

(2)指責的姿態(blaming)

指責者重視的是自我。其自我價值感偏低，認為當別人服從時，自己才有價值，所以採取指責、批評或評斷他人的態度。其外在表現猶如獨裁者般優越，想要控制別人，並且要別人尊敬。其內在語言是「都是你的錯」、「你從來沒有做對一件事」、「在這裡就要聽我的」。Satir認為指責型也是低自尊，是當事人對自身存在價值感受的一種防衛表現。

在華人社會，指責的內在狀態似乎較為複雜。其一是跟華人傳統威權思想的社會化有關，此類指責姿態是父權社會化的結果。其二則關乎顯現在他人面前的顏面問題，其內在的心態是不願被看貶，捍衛個人在他人眼中的尊嚴感；此似乎較接近Satir指責姿態的原型。

指責的外顯行為下可能有要展現權力和位階的意圖，強調唯我獨尊的意識；反映的是傳統華人重視階層、倫常，尊重威權，強調權力義務的價值觀。這類指責的溝通特徵多少可以從孝道文化得知。葉光輝(2009)在介紹華人孝道演變的歷史脈絡中提到，自漢朝到清代孝道逐漸發展成「絕對主義倫理觀」，孝道趨向絕對的權威服從。這不僅反映在子女對於父母的順從抑己，更擴展為效忠於統治階級、服從封建社會秩序的表現。其中「權威性孝道」的「抑己順親」即是典型，以儒家尊親作為做人的原則，子女須壓抑自己，服從長上；而這也鞏固了上位者或父執輩的威權傾向。再者，如黃曬莉(2006)所提出的中國人化解衝突的方式之一「抗爭」，乃是一種為爭取己方利益或維護己方立場，不斷聲張自己的主張或權益，且不惜削弱、抨擊對方的做法；其表現之一是「威權強制」，利用既有的權勢，如名份、地位、聲望、資源或獎懲權等，企圖以說服、命令、制裁或壓制等方式，強迫對方屈從或不

戰而退。這類指責表達的方式即源自傳統父權文化的背景，不必然跟個人存在價值感有關，而是一種唯我為是的理所當然。這樣傾向威權的指責，即包含了階層觀念下的遂行己意及彰顯己志的理所當然。

其次，面子是中華文化的特徵之一，在人際互動中我們會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楊國樞(1993b)認為中國人在心理與行為上甚易受他人影響，在心理上我們希望在他人心留下好的印象。黃光國(2009)更指出儒家社會中，個人為了要維護自己在人際網絡中的位置，會消極或積極地保護自己的臉面，讓自己不會喪失面子。於是衝突發生之際，有時為了顧及自身的面子及自尊，或是重視名譽，也會容易出現將過錯先推給對方的情況。此與黃囑莉(2006)提出的「出擊反擊」相似，出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或「最佳的防衛就是攻擊」的心態。雖然就與自己衝突的對方來說，這是無禮的反應，甚至有違華人以和為貴的特質；但是在對方強烈的批評或曲解之下，個人也必需注意周圍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基於在乎面子與維護尊嚴的內在心理機制，於外也容易出現類似維護顏面的指責溝通姿態，應有包含在乎他人眼光和維護自身面子尊嚴的概念。因此，就華人來說，指責的意涵是同時具有威權的指責和維護顏面的指責，研究者將其統稱為「指責護顏」。

(3)超理智的姿態(super-reasonable)

超理智者重視的是情境；特徵是像電腦一般過於理性，忽略自己跟對方的情感連結。他們認為自己非常有道理，講話時會引經據典並且咬文嚼字，常用很長的句子，表現出自己有智慧、擁有主導權的樣子。其內在語言是「我是對的」、「你不了解」、「我知道的更多」、「你不合邏輯」、「我知道什麼對我們最好」。

研究者認為理智與超理智同屬於一個光譜，唯位置不同代表程度上的差異。理智的人可能在思考、計算、推理與邏輯都具備相當好的能力，但是這樣注重前因後果、邏輯判斷、科學根據的特質，不代表沒有感覺或情緒，只是他們不用內在的直覺與衝動行事。換言之，強調智性而忽略關照他人心情的溝通方式，可能較接近 Satir 的「超理智」。也就是說，一個人可能同時具有理智和情緒，但是強調理性思考且具有情緒感受的人，可能會顧及自己的面子和對方的面子，不會讓對方覺得為了爭你對我錯，而不顧及彼此情誼。因此，在溝通的情境中，是否考量對方感受的程度，還是只以自己立場為主而忽略對方與情境，是區分理智與超理智的關鍵。

airiti

不論中西文化，對於化解衝突、取得共識的方式略同，皆強調採用理論證據的使用；但若忽略動之以情的結果，往往會干擾溝通合作的意願。前述黃囁莉(2006)提及的抗爭方式之一「據理力爭」，其所秉持的就是「天下唯理可服人」。黃囁莉(2008)指出「論理式衝突」係源於個人堅持自己的價值觀或是非判斷，為了說服他人同意或支持自己的觀點，不自覺演變為兩人間的爭議。換言之，在人際互動的過程，如果過度自以為是或自我中心而損及對方，或者過度講究理性思考而無法顧及對方的想法感受，而表現出以理服人和據理力爭的行為，這就相當類似於超理智溝通姿態。此外，黃光國(2009)在論述華人的面子文化時也指出，「愛面子」或「要面子」並不只會促使人做出各種「虛面子」的行動，它也能促使個人做出追求實際成就的「爭面子」行動。如果個我需要一再證明自己懂得很多，或是超勝不俗，那麼在人際表達上，就會不斷想彰顯面子或證明能耐，出現類似超理智的溝通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華人超理智的意涵可能包括唯理至上的超理智，和證明自己的超理智，此兩個面向統稱之「重理證己」。

(4)打岔的姿態(irrelevant)

打岔者忽略自己、他人與情境；當遇到焦慮或想逃避的情況時，就會說話不切題，眼神和對方沒有接觸，身體呈現沒有重心，甚至走來走去或者是離開現場。其常出現與當前主題無關的話語，例如「我忘了」；或沒來由的提問「幾點了？」，「你在哪裡找到鞋子？」。打岔也是源於低自尊，是一種無法面對他人和情境，難以適切表達自己的防衛狀態。

在華人文化中，打岔型的溝通同時具備正、反面的意義。其中，事緩則圓的態度可以預留周全思考的時間與空間；而沉默、忽略或離開則可能是消極抵制的展現。此兩者與習慣明確表達自身立場的西方特質的確不同。華人重視事緩則圓，遇到事情不要操之過急，慢慢來想方法處理，就可以得到較完滿的結果。面對歧見時，西方人傾向採取直接表達自己的立場；但華人可能採取迂迴的方式處理，表面上沒有否定或辯明，甚至顧左右而言他。兩種文化的溝通方式，就好比是華人的太極拳與西方的拳擊。這種擱置迂迴的方式，容易令人感覺在逃避真正的問題，但其實有可能是考量情境或大局的展現；這和Satir認為「打岔型」的內在是混亂的描述實有不同。

和Satir描述的「打岔型」較為接近的是黃囁莉(2006)所指認的退避和斷裂以及陳秉華(2001)的曖昧溝通。黃囁莉認為退避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平靜，可以淡化衝突，不再激化或擴昇，但卻內隱著強大的殺傷力，可能使當事的雙方關係惡化，甚而斷裂。其中一種反應是消極抵制，對於他方的欲求，以沉默、冷漠、忽略或怠工、被動、不合作、工作不力等方式，使他方無法順利遂行其意；另一種隔離棄守，則是「走為上策」，類似儒家文化所鼓勵的「道不同，不相為謀」；若空間無法隔離，另一種是心理上的隔離，如閉上眼睛、充耳不聞、沉默寡言、唯唯諾諾、心不在焉。上述三種的退避方式與溝通姿態中傾向逃避的打岔頗為接近。

陳秉華(2001)指出，對於一個習慣以關係和諧為重的華人，一旦需要公開面對人我之間的不一致，進行溝通協調時，其所承受的心理與社會壓力是很大的；這當中包括了公開面對不一致後引起的人際緊張與焦慮，以及潛在的對於關係破壞的擔心。因此，個體可能在溝通互動過程，盡量控制情緒與修飾語言的表達，盡量使用試探性的、間接的、含糊的表達方式，以增加討論的空間，或是對於自己需求與想法的表達有所保留，而出現所謂的曖昧式溝通。這樣的溝通模式也相當符合Satir所描述的打岔，唯內在所秉持事緩則圓的考量，其內心可以是穩定，而表達是迂迴的，希望得到急事緩辦的機會，並非低自尊的混亂和手足無措。因此，華人文化下，打岔的意涵可能包含逃避的打岔和事緩則圓的打岔，此兩個面向先以「打岔迂迴」稱之。

總之，華人社會中類似不一致溝通姿態的使用，有其傳統價值觀的背景依據。阮新邦(2008)認為大傳統的價值理念透過小傳統的轉化，如五倫關係或家族主義，影響一般人日常行為裡的抉擇及其背後的理據。個人一方面從此架構或意義系統尋找或獲得生活的安頓和終極式的存在意義，另一方面亦由此協調日常情境中遇到的種種衝突。因此，所謂的不一致的溝通姿態也成為一個對照參考的架構，用來理解及重新思考華人社會中溝通的方式，卻不必然和自尊高低有關；而一致的內涵既是一種個人修為的表現，跟西方強調的自我功能(高自尊)應該有關。表1即是從前述特有文化以及內在狀態或動機等，與Satir模式對照而區分出的溝通姿態。研究者認為兼具文化傳承與西化影響的台灣人，其溝通姿態的意涵也極可能出現兼有Satir理念與傳統特徵，值得透過研究加以檢驗。

(二) 過往溝通姿態量表的檢視

研究者進一步檢視陳奕良(2001)、卓紋君、簡文英(2003)、盧宜蔓(2009)、陳奕吟、卓紋君(2017)的溝通姿態量表。除了從原始題項和正式題項的對照，來了解題項中華人文化的觀點外，也從這些題項是否在其他量表中被使用或出現，來加以檢視。在上述量表中，沒有討論顏欣怡、卓紋君(2013)所修編的量表，是因為其與最新版本的陳奕吟、卓紋君(2017)的版本差距只在於3題與華人文化較無直接關聯的題項，因此決定排除。

1. 原始量表的檢視

陳奕良(2001)的原始量表中，有符合華人文化的題項，「當他堅持己見時，我就不再多講話而順從他。」，此即是討好意涵中的顧及關係，但因題意相似而刪除。「當兩人氣氛尷尬時，我會藉由談論其它事情來轉移話題。」，即是接近打岔意涵的事緩則圓，但因主成份分析結果不佳而被刪除。此外，「意見不同時，我會溝通，直到兩人找到彼此都贊同的方式。」，此是一致意涵中的協商雙贏，但因量表題項重複而被刪除。

盧宜蔓(2009)的原始量表中，有編擬符合華人文化中維護顏面的指責意涵的題目，如「對方不重視我，我會生氣。」，但該題在項目分析過程即被刪除。另外，盧宜蔓在題目過多可能影響受試者填答意願及為使各分量表的題數相當等考量下，採用一致性考驗來求取校正項目總分的相關係數(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以了解題目之間的一致性，因此刪除相關係數較低者，最後保留35題。其中第19題「與人發生爭執時，即使我理虧，我也會在口頭上不甘示弱。」也都是維護顏面的指責。第25題「為了避免與他人產生衝突，即使我是對的，我會讓步。」即是顧及關係的討好。第37題「與人互動時，我會裝傻、講笑話或亂扯一通來減緩原本緊張的氣氛。」即是緩解氣氛、事緩則圓的打岔的意涵題項。雖然這幾題的相關係數稍低，但考量其含有華人文化特質，因此本研究重新納入量表的題項，進行分析。

從對照原始量表到形成正式量表的過程可知，上述作者或多或少似有考量含攝文化的溝通情形；但是透過統計分析的結果，這類題目均沒有被保留。研究者認為

airiti

此極可能是因為當初所擬的含攝文化的題項數量過少且又殊異，因而和其他以Satir理念為本所編列的題項相關太低，無法被保留在正式量表中。

2. 正式量表的檢視

仔細閱讀陳奕良(2001)正式量表的題項，會發現隱含華人文化的溝通特質。例如討好溝通姿態的題項，「當我們之間發生了某些事，我心裡雖然很在意，但口中卻會說沒關係。」這是一種顧及關係的忍讓；此題在陳奕吟、卓紋君(2017)的「人際溝通量表」中也有沿用。而「當事情出差錯時，我會先怪罪他人。」是維護顏面的指責，此題在盧宜蔓(2009)的「人際溝通量表」和陳奕吟、卓紋君(2017)的「人際溝通量表」中也有沿用。但其他的5題有華人文化意涵的題項，卻沒有在後續量表中被使用。如在指責溝通的題項中，「兩人有爭執時，即使我理虧，我仍會在口頭上不甘示弱。」與「當他罵我時，我會生氣地罵回去。」即是一種維護顏面的指責，為了維護自身面子尊嚴而反擊；超理智溝通姿態中，「當他指責我時，我會努力找數據、資料來證明我說的是對的。」該題反映出華人文化中以智性證明自己的能耐；打岔溝通姿態中，「我的看法與他不一致時，我會顧左右而言它來緩和氣氛。」與「當他的要求讓我無法接受時，我會轉移話題。」也具有事緩則圓，以迂迴婉轉的方式保持關係的意味。

檢視卓紋君、簡文英(2003)的「父母溝通姿態量表」的題項時，研究者發現其指責的溝通姿態顯示出權威的指責，超理智溝通姿態也傾向傳遞出唯理至上和以理服人的觀點。例如，「我與孩子說話會特別強調理智、證據的重要。」；「我跟孩子講道理、說明看法的機會多於跟他分享我個人的情緒感受。」等。此外，討好的溝通姿態題項中，「當我與孩子意見不一致時，我通常會勉強改變自己來配合他。」也可能是顧及親子關係的表現，而非感到弱勢或委屈的心態。雖然打岔的題目較多顯示出心不在焉、消極抵制的態度，但「當孩子的要求讓我無法接受時，我會轉移話題來分散注意力。」該題，則隱約透露出急事緩辦的態度。

檢視盧宜蔓(2009)正式溝通量表，當中只有少數含攝文化意涵，且後來出現在其他研究中的題目。例如，討好溝通的題項：「當發生事情時，即使我很在意，但口頭上會說沒關係。」顯示出為了關係而打圓場的態度。指責的題項：「當事情出

airiti

差錯時，我會先怪罪他人。」；「當關係緊張時，對方應該先讓步。」，接近維護顏面的概念。打岔姿態的題項：「在關係中出現緊張的情境時，我會裝作沒事地轉移焦點。」，強調緩解氣氛的重要，類似事緩則圓的概念；顏欣怡、卓紋君(2013)為配合研究主題，該題改成「當他/她指責我時，我會轉移話題，模糊焦點。」。此外，前述四題也出現在陳奕吟、卓紋君(2017)的「人際溝通量表」中。

前人在編製量表過程，某些華人文化觀點隱約已被注意，可惜不夠周全；以東西方文化概念的平衡的角度來說，關注華人溝通文化特質的題項仍相對較少。由於原來Satir溝通姿態概念的題目比較多，在因素分析的統計抉擇之下，含攝文化的題項可能就被刪去了。從上述探討與分析可知，具有華人文化底蘊的台灣人和西方理論中面對人際互動以及衝突因應的動機可能不盡相同，需從歷史文化的傳統以及仍然保留的價值觀中，加以理解。因此，研究者選擇重新編擬一份符合華人文化特質的溝通姿態量表，並且考量年齡的影響，擴大樣本數與取樣範圍，以提高信度；重新確認題項，以提高分量表的效度。

(三)效標關聯效度的考量與選擇

承上，本研究重編台灣人的人際溝通量表，自然需要擇取適當的工具作為檢核構念的效標。從前述探討中可知，黃囍莉(2006)根據己方的利益或意見，以及對方的利益或意見，將衝突化解方式分為四個象限，分別是協調、抗爭、退避、與忍讓。黃囍莉認為在華人的衝突化解方式中，「協調」是利雙贏的建設性衝突處理方式，此類似一致溝通的概念；「抗爭」則是傾向指責；「退避」的描述和打岔較為接近；「忍讓」以對方為重，表面與原來討好概念類似。本研究採用蔡金蓮(2009)修訂自黃囍莉(2006)之「人際互動量表」作為效標關聯效度的檢核依據，該量表於下文工具處介紹。

再者，回顧黃囍莉分類抗爭(競爭)的方式，雖有偏向理智或超理智的意涵，但只有兩題，對應的量表也沒有單獨的信效度；因此不以此量表檢視超理智的內涵。Norton(1978)歸類11種溝通風格，其中「精確性」指的是個體為了堅持心中的信念，會試圖講求證據和他人把話說清楚辯明真相。此內涵與本量表的「重理」和「證

己」，頗有相通之處；本研究選取李佳倫(2003)修訂自Norton(1983)「溝通風格之測量」(Communicator Style Measure)之中文版題項作為效標。

此外，Satir 認為自尊(self-esteem)是一個人思考感受時的價值，和對自己和環境的掌握感，以及認為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楊東蓉譯，2008/2019)。盧宜蔓(2009)針對溝通姿態和自尊進行研究時，發現高自尊組大學生使用一致溝通的人數明顯高於低自尊組大學生，結果符合Satir等人(林沈明瑩等譯，1991/1998)認為一個人的溝通方式與其自尊之間有顯著相關。從前文提出對應Satir溝通姿態之華人的溝通方式，在內涵上最明顯與自尊有關者應屬於圓融和一致的溝通，其餘則未定。是以，本研究亦選取自尊作為了解效標關聯效度的檢測指標。

(四) 溝通姿態的計分方式的省思

關於溝通姿態的計分方式，過去研究者都以受試者在五個分量表中，取其最高分者為之。盧宜蔓(2009)訂出其抉擇標準為：假若五個分量表中，出現兩個以上同樣最高分者，或者最高分與第二高分之間的分數差距小於2分者(不包括2分)，該份問卷即不進行後續的統計分析。顏欣怡、卓紋君(2013)的做法是，出現兩類(溝通姿態)以上同分者即從統計樣本中刪除。無論如何，他們承認如此會失去了許多兼有同等溝通姿態的樣本資料。換言之，這種採類型論的做法，無法針對那些被刪除的受試者加以探究，可能因此忽略其它豐富的內涵。在統計分析上以類型區分個人溝通特質的方式，不但和Satir反對以溝通姿態來定義或標籤一個人(Banmen, 2002; Smith, 2002; Tam, 2006)的精神相違，同時也不符順華人的溝通會視他人與環境而調整的傾向。雖然大部分的人會有一個主要的溝通姿態，但溝通姿態只是描述行為而非人格分類的定義或標籤，每一個人可能有不同的溝通姿態。重新編擬量表和量表解釋時，宜轉換成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溝通姿態，甚至是同時表現的行為；亦即避免定義為單一溝通姿態，而是將個人使用不同溝通姿態的程度作為解釋的原則。

總之，研究者認為Satir模式的溝通，仍有許多值得華人參考的地方，Cheung和Chan(2002)也持同樣看法。而研究者認為有需要重新思考目前研究中已出現的量表，並發展更適合含攝文化的題項，加以檢驗。根據前述之相關文獻，本研究假設

airiti

修訂後的量表仍包括五個層面，唯題項內容包含符合華人文化背景的概念，而有所增減。如此，已被廣泛使用的Satir取向的溝通概念，其可用性和實際價值，才能夠更加提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內容和實施過程說明如下。

(一)問卷設計

研究者依據前述反思與探討，編擬出測量台灣人人際溝通量表，設計成問卷。其中包括：

1. 個人基本資料

問卷中的個人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現居地、與聯絡信箱(填寫目的為中獎聯絡使用)等六項。

2. 人際溝通量表

本研究根據Satir理論，並參考前述關於溝通姿態的測量工具(陳奕良，2001；卓紋君與簡文英，2003；盧宜蔓，2009；顏欣怡、卓紋君，2013；陳奕吟、卓紋君，2017；Lau, Leung, & Chung, 2019)，加以檢視，並根據前述針對華人文化下國人溝通特性的反思，增編題目，針對台灣民眾施測。其中「討好」、「指責護顏中的指責」、「重理」、「打岔」、「一致」是參考最近陳奕吟、卓紋君(2017)及顏欣怡、卓紋君(2013)兩者最後呈現的溝通姿態量表為主，而「忍讓」、「指責護顏中的護顏」、「証己」、「迂迴」、「圓融」則參考自前述各量表題項最早出現的來源。量表題目的編擬依據如表2所示。

本量表採5點量尺計分，選項1代表「幾乎不會如此0%~20%」到選項5代表「總是如此80%~100%」。受試者在每個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傾向該向度的人際溝通姿態。

表2 人際溝通姿態量表之題項及參考來源

溝通姿態	因素	題 目	參考來源
討好	討好－弱勢的討好	2.在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我常是委屈求全的一方。	陳奕吟、卓紋君(2017)
		3.我會想讓他人開心而隱藏自己的喜好或意見。	陳奕吟、卓紋君(2017)
		4.我不敢表達負面的情緒或感受，因為我擔心他人會不喜歡我。	陳奕吟、卓紋君(2017)
		5.我會不顧自己的需要，先去滿足他人。	陳奕吟、卓紋君(2017)
	忍讓－顧及關係的討好	6.為了避免與他人產生衝突，即使我是對的，我也會讓步。	盧宜蔓(2009)
		7.為了關係或長遠的未來，我願意暫時忍讓。	自編
		8.當他人刺傷了我的心，我心裡雖然很在意，但口中卻會說沒關係。	陳奕良(2001)
		9.他人認為我不對時，不管是否有理，我都會很快表達歉意，減少他人的不滿。	卓紋君、簡文英(2003)
指責	指責護顏－威權的指責 維護顏面的指責	1.當意見不同時，我會因為自己的意見比他人好，而批評他人。	陳奕吟、卓紋君(2017)威權
		4.遇到讓我不滿意的事，我通常先責怪他人。	自編威權
		5.當我不高興時，我會以強勢的態度要求他人配合我的想法或需求。	自編威權
		6.他人不重視我，我通常會感到生氣而責怪他人。	盧宜蔓(2009) 維護顏面
		7.與人發生爭執時，即使我理虧，我也會在口頭上不甘示弱。	陳奕良(2001) 維護顏面
		8.當互動關係緊張時，我總覺得他人應該先讓步。	盧宜蔓(2009) 維護顏面
		9.我會因為面子掛不住而指責他人的不是。	自編維護顏面
超理智	重理－唯理至上的超理智	2.面對任何人，態度冷靜和理性回應是我一貫的作風。	陳奕吟、卓紋君(2017)
		3.我比較在意事情是否能解決，較少考慮人的感受。	顏欣怡、卓紋君(2013)
		5.我面對衝突和壓力時，會像電腦般聚焦在問題上，以求有效率地解決。	自編
	証己－證明自己的超理智	7.我常分析自己的意見給他人聽，以顯示我是有兩把刷子的人。	自編
		8.我說話會講究邏輯思考、理性思維，來顯示我是聰明、有智慧的人。	自編
		10.我說話常會引經據典，好讓人佩服我。	自編

表2 人際溝通姿態量表之題項及參考來源(續)

溝通姿態	因素	題 目	參考來源
打岔	打岔－ 逃避的打岔	1.當我的看法與他人不同時，我會故意忽略，假裝沒這回事。	陳奕吟、卓紋君(2017)
		2.為了減少尷尬，我會說一些言不及義的話。	顏欣怡、卓紋君(2013)
		3.當我不想理他人的時候，我會把自己放空。	自編
	迂迴－ 事緩則圓的 打岔	6.當關係或氣氛尷尬時，我會藉由談論其它事情來轉移話題。	陳奕良(2001) 事緩則圓
		7.當他人要求我無法接受時，我會顧左右而言他，以免產生衝突。	陳奕良(2001) 事緩則圓
		8.當我與他人意見不合時，我會雞同鴨講，不表明真正看法，來緩和氣氛。	陳奕良(2001) 事緩則圓
		10. 在關係出現緊張情境時，我會裝作沒事，故做輕鬆狀。	盧宜蔓(2009) 事緩則圓
	一致－ 人我兼顧的 一致	1.在互動中發生問題時，我可以適時地向他人表達我內在的真實感受。	陳奕吟、卓紋君(2017)
		2.我接納我自己真實的面貌，期許自己是內外一致的人。	陳奕吟、卓紋君(2017)
		3.溝通時，我既會滿足自己的需要，同時也會顧及他人的立場。	自編
		4.與他人互動時，我可以考量他人和情境，適時地表達自己的感受與需要。	自編
圓融－ 反求諸己的 一致		6.我會透過尊重的態度，與他人討論雙方不同的期待。	自編
		7.意見不同時，我會溝通，試著找到彼此都贊同的方式。	陳奕良(2001)
		8.即使我對他人有所不滿，我仍願意理解對方，與其協調，並調整自己。	自編
		9.與人互動時，我會看到自己的不足，面對它，並且從中提升自己。	自編
		10. 與人互動時，我可以欣賞及接納彼此之間的差異，並從中有所學習。	自編

註：研究者在進行因素分析時係以每個因素為一組，來進行標號；如討好會有「討好1」至「討好10」，指責也會有「指責1」至「指責10」等。因此，各因素的題號看似會有重複的情況；另，這些編號也與表4和圖1的題號對應。

量表完成後，研究者即邀請學者、具多年Satir實務工作經驗者，及統計專家等三名共同協助審核，以建立專家效度。這些專家根據各構念所包含的題項逐一檢視，包括題目內容是否能真正測出構念所代表的心理特質或內涵，詞句是否適切，並且提供修正意見。

3. 效標關聯效度之工具

如前述，本研究以人際互動量表(蔡金蓮，2009)、溝通風格量表(李佳倫，2003)和洪瑞黛(2012)的自尊量表作為效標關聯效度檢測之效標。

(1)人際互動量表

該量表係蔡金蓮(2009)修訂自黃囍莉(2006)而成，共有33題；採李克特五點量尺，由「總是如此」到「從不如此」，分數越高代表受試者在該解決策略上偏好程度越高。其四個構面的內部一致信度分別是「競爭」.867、「逃避」.816、「忍讓」.815、「協調」.891；重測信度：「競爭」為 .77、「逃避」為 .80、「忍讓」為 .75、「協調」為 .79。效度方面，構面的KMO值分別為：「競爭」.89、「逃避」.80、「忍讓」.86、與「協調」.91；可解釋變異量為「競爭」52.426%、「逃避」47.818%、「忍讓」47.554%、與「協調」48.182%。

(2)溝通風格量表

該量表由李佳倫(2003)修訂並翻譯自Norton(1983)「溝通風格之測量」(Communicator Style Measure)。本研究只擇取「精確性」分量表，共有4題，其內部一致信度為 .65，屬於尚可(吳明隆，2009)。其量表形式為李克特五點量尺，選項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者，代表傾向此向度溝通風格的表現越多。

(3)自尊量表

自尊(Self-esteem)由Rosenberg、Schooler、Schoenbach和Rosenberg(1995)提出，指的是個人對自我的全面性、穩定性評價與感受，包括正面與負面的自我評價態度，而非由特定經驗或評價形成的期望。本研究採用洪瑞黛(2012)翻譯的中文版，共有10題，其內部一致信度為 .82；效度方面，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也有可接受的適配度(卡方自由度比 = 2.87、RMSEA = .07、GFI = .98、IFI = .98、PNFI = .32)。

(二) 施測過程

本研究採取網路線上問卷調查方式，取成年20歲以上的台灣民眾為研究對象。於2019年8月透過「surveycake」施行，將訊息發布於社群網站與通訊軟體，廣徵有意願者填答。為確認填答者的認真度，問卷中穿插兩題測驗題，如「請選擇3」、「請選擇2」；兩題中若有任一題為誤答，即視為無效問卷。透過這樣的設計，保留網路調查的便利性，和問卷的有效性。

此外，為有效提高民眾上網填答的意願，研究者特舉辦抽獎活動，每隔兩週進行一次抽獎，共進行三次；未中獎者可累積抽獎。獎品為7-11禮卷200元，共計30名。研究者將得獎名單公布於社群網頁中，除以昭公信之外，也顯現活動的誠信度。網路問卷調查時間約一個月，完成線上填答的台灣民眾總計有516人；經篩選後，共得有效問卷413份。研究者考量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因此將人數隨機安排成兩組，分別為203人和210人(如表3)。

探索性因素分析中，以女性居多，有126位，佔60.0%；年齡以31至40歲居多，有97人，佔46.2%；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有119人，佔56.6%；婚姻狀態部分，以已婚居多，有134人，佔63.8%。驗證性因素分析中，女性亦超過半數，有109位，佔53.7%；年齡同樣以31至40歲居多，有86人，佔42.4%；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有121人，佔59.6%；已婚者過半數，有103人，佔50.7%。

三、研究結果

(一) 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進行因素分析之前，研究者先針對有效樣本，進行人際溝通量表之項目分析，以決定這些問題是否能真正區分台灣人的溝通姿態。項目分析是依總分高低，將樣本分成高分組和低分組(總分依高低排序選出高分的27%及低分的27%的分數)，然後以比較平均數之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吳明隆，2009)。檢定結果未刪除任何題項，皆予以保留。

表3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n = 413$)

層面	類別/範圍	探索性因素分析 ($n = 210$)		驗證性因素分析 ($n = 203$)	
		人數	%	人數	%
性別	男	84	40.0	94	46.3
	女	126	60.0	109	53.7
年齡	21-30	26	12.4	36	17.7
	31-40	97	46.2	86	42.4
	41-50	41	19.5	47	23.1
	51-60	25	11.9	18	8.9
	61-68	21	10.0	16	7.9
教育程度	國(初)中	1	0.5	3	1.5
	高中(職)	17	8.1	17	8.4
	大學(專科)	119	56.6	121	59.6
	研究所以上	73	34.8	62	30.5
婚姻狀態	未婚	68	32.4	91	44.8
	已婚	134	63.8	103	50.7
	其他	8	3.8	9	4.5
職業類別	學生	6	2.9	6	3.0
	軍公教	51	24.2	58	28.6
	服務業/金融/醫療保健	60	28.6	50	24.6
	資訊/傳播/設計	13	6.2	9	4.4
	藝文/自由業	15	7.1	10	4.9
	製造業/農林漁牧	35	16.7	46	22.7
	其他	30	14.3	24	11.8
現居地	北部	49	23.3	64	31.5
	中部	18	8.6	10	4.9
	南部	139	66.2	126	62.1
	東部	3	1.4	2	1.0
	離島	1	0.5	1	0.5

其次，根據 Kaiser-Meyer-Olkin(KMO)的取樣適切量為 .772，大於 .5者，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吳明隆，2009)。從Bartlett球形檢定之 χ^2 值為3608.699(自由度為666)來看，達 $p < .001$ 之顯著標準，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之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研究者考量原量表的發展乃參考相關文獻，且為探求華人文化下的溝通姿態特性，因此沒有事先確定因素構念數量。本研究採主成份分析法來估計因素負荷量，選取特徵值(eigenvalues)大於1的因素，並以最大變異數法進行轉軸。

轉軸後，共得9個因素，題數分別為4(討好)、4(忍讓)、7(指責)、3(重理)、3(證己)、3(打岔)、4(迂迴)、4(一致)、5(圓融)題，共37題。結果如表4所示。人際溝通姿態量表總解釋變異量為65.074%，分量表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58到 .825之間；顯示本研究之人際溝通量表有相當程度之適切性。

本研究以Cronbach α 值做為本量表信度考驗的方式，並以 $\alpha \geq 0.7$ (Nunnally, 1978)作為依據。討好的Cronbach α 值為 .778、忍讓為 .867、指責護顏為 .836、重理為 .678、證己為 .774、打岔為 .674、迂迴為 .766、一致為 .802、圓融為 .874，而總量表Cronbach α 值則為 .806。其中除了重理和打岔，其餘皆高於 .7；顯示其信度屬可接受的範圍。

本研究發展出的37題版，共有9個溝通姿態，可解釋的總變異量65.074%。根據吳明隆(2009)，量表之解釋變異量若能達到60%以上，表示萃取後保留的因素相當理想。本研究各因素的題目內涵，只有「指責(護顏)」符合Satir模式溝通姿態的特徵，顯示此類人際溝通不若前述推論可區分為二，其指責的人際表現即兼具強調個人意志、權力以及維護顏面與尊嚴的意涵。其他題項的內涵皆有增加和變動，分別為「討好」、「忍讓」、「重理」、「證己」、「打岔」、「迂迴」、「一致」、「圓融」；亦即如文獻之析論，增加了華人文化內涵的溝通特色。

進一步分析這9種溝通姿態的相關，根據吳明隆(2009)，研究者選取相關係數超過 .4(即中度相關者)， p 值小於 .01者來加以探討。表5顯示，討好和忍讓的相關為 .575，重理和証己的相關為 .446，打岔和迂迴的相關為 .538，一致和圓融的相關為 .575。由此可見，含攝文化的溝通和接近Satir的溝通姿態，兩者之間有顯著相關，但又是各自獨立的溝通型態。誠如Lu和Yang(2006)注意到的，面臨西化影響又保有中

表4 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平均數、標準差與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N=210)

題號	平均數	標準差	轉軸後因素負荷量									共通性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六	因素七	因素八	因素九	
討好2	2.49	0.945	0.023	0.036	0.416	-0.011	0.036	0.589	0.063	-0.203	-0.023	0.568
討好3	2.91	0.884	0.042	0.038	0.209	0.037	0.154	0.744	0.050	0.048	0.096	0.639
討好4	2.51	0.865	0.071	0.018	0.267	-0.194	0.068	0.721	-0.009	0.103	0.011	0.649
討好5	2.69	0.935	0.119	-0.147	0.409	0.129	0.038	0.558	0.148	-0.090	-0.095	0.571
討好6	2.84	0.901	-0.017	0.030	0.822	-0.064	0.065	0.163	0.040	0.080	0.108	0.731
討好7	3.25	0.910	-0.061	0.098	0.738	-0.001	0.031	0.353	-0.032	0.029	0.109	0.696
討好8	2.99	0.968	0.022	0.034	0.686	-0.198	0.189	0.341	-0.156	0.018	0.009	0.688
討好9	2.80	0.987	-0.027	-0.019	0.777	-0.019	0.125	0.119	-0.084	-0.088	0.074	0.656
指責1	1.98	0.776	0.590	-0.130	0.027	0.083	0.005	-0.011	0.292	-0.052	-0.090	0.469
指責4	1.96	0.820	0.722	-0.145	-0.076	-0.109	0.115	0.045	0.058	0.054	0.028	0.582
指責5	1.83	0.798	0.778	-0.082	-0.045	-0.103	-0.057	-0.001	0.064	0.164	0.084	0.666
指責6	2.12	0.827	0.597	0.028	0.014	-0.047	0.003	0.137	0.181	-0.266	0.007	0.482
指責7	1.87	0.777	0.718	-0.174	0.019	-0.047	0.036	-0.044	0.011	0.016	0.070	0.557
指責8	1.89	0.796	0.688	0.054	-0.123	-0.034	0.032	0.032	0.091	0.029	0.136	0.522
指責9	1.78	0.700	0.745	-0.015	0.150	-0.010	0.041	0.071	0.080	-0.009	0.112	0.604
超理智2	3.63	0.832	-0.194	0.144	0.064	0.213	0.041	0.016	0.179	0.705	0.010	0.639
超理智3	2.66	0.834	0.227	-0.033	-0.065	0.075	0.033	0.002	0.150	0.744	0.093	0.647
超理智5	3.36	0.908	-0.001	0.185	0.005	0.157	-0.076	-0.013	-0.008	0.743	-0.080	0.623
超理智7	2.79	0.926	0.145	0.048	-0.095	0.051	0.082	0.143	0.804	0.071	0.116	0.727
超理智8	2.89	1.010	0.180	0.076	-0.065	-0.033	0.010	0.056	0.787	0.184	0.095	0.710
超理智10	2.35	0.958	0.293	0.011	0.029	0.076	0.075	-0.058	0.727	0.034	-0.076	0.636
打岔1	2.20	0.810	0.148	-0.191	0.235	-0.120	0.059	-0.092	0.130	-0.092	0.678	0.625
打岔2	2.44	0.890	0.040	-0.033	0.100	-0.024	0.268	-0.016	0.009	0.009	0.767	0.674
打岔3	3.11	1.004	0.174	0.080	-0.031	0.097	0.143	0.156	0.009	0.080	0.751	0.662
打岔6	3.29	0.834	-0.032	0.114	-0.083	0.194	0.654	0.327	0.005	0.060	0.131	0.614
打岔7	2.94	0.870	0.093	0.032	0.059	-0.016	0.813	0.112	-0.012	-0.061	0.134	0.708
打岔8	2.51	1.008	0.114	-0.008	0.153	-0.146	0.798	0.010	0.037	-0.100	0.079	0.712
打岔10	3.06	0.921	-0.027	0.087	0.246	0.008	0.668	-0.052	0.175	0.126	0.160	0.591
一致1	3.40	0.918	0.062	0.084	0.026	0.773	-0.065	-0.030	0.104	0.066	0.016	0.630
一致2	3.83	0.845	-0.118	0.208	-0.096	0.700	-0.071	-0.131	-0.137	0.261	-0.029	0.666
一致3	3.80	0.769	-0.166	0.376	-0.030	0.678	0.101	0.007	0.057	0.184	0.055	0.679
一致4	3.77	0.748	-0.139	0.342	-0.167	0.737	0.056	0.091	0.060	0.071	-0.083	0.734
一致6	3.91	0.762	-0.082	0.797	-0.181	0.199	0.110	0.122	0.008	0.161	0.031	0.768
一致7	3.93	0.806	-0.054	0.825	-0.187	0.169	0.007	0.219	0.013	0.054	0.042	0.799
一致8	3.79	0.809	-0.101	0.820	0.078	0.067	0.103	0.007	0.006	0.044	-0.046	0.708
一致9	3.81	0.812	-0.110	0.708	0.264	0.205	-0.091	-0.223	0.058	0.026	-0.112	0.699
一致10	3.91	0.727	-0.116	0.744	0.251	0.265	0.055	-0.173	0.079	0.065	-0.056	0.747

表5 溝通姿態各分量表之相關分析

分量表	討好	忍讓	指責 護顏	重理	証己	打岔	迂迴	一致	圓融
討好	1								
忍讓	.575**	1							
指責護顏	0.119	-0.030	1						
重理	-0.076	-0.044	0.036	1					
証己	0.089	0.010	.352**	.446**	1				
打岔	.190**	.260**	.257**	0.014	.188**	1			
迂迴	.283**	.378**	0.077	0.077	.189**	.538**	1		
一致	-.142*	-0.090	-.181**	.373**	.199**	-0.008	0.043	1	
圓融	0.008	0.130	-.229**	.219**	0.101	0.010	.152*	.575**	1

* $p < 0.05$, ** $p < 0.01$

華文化傳承的台灣人，其呈現在社會互動上的「我」並非單一，而是雙元的自我。本研究也發現，直接套用Satir模式的五種溝通來瞭解台灣人的溝通是不足的；九種溝通型態除指責護顏外，其他八種均出現類似雙元的溝通現象，亦即有類似西方的一致和不一致溝通，以及其所對應的包含華人文化底蘊的溝通。

搭配表6效標關聯效度分析來看，討好和忍讓分別與人際互動量表(蔡金蓮，2009)中的忍讓，相關為 .546以及 .633。此反映出在貼近本土化的人際特性的考量之下，面對權威者時，習慣以弱勢的討好方式因應，是與息事寧人和順從對方的方式來解決衝突，的確有所關聯。而且，顧及關係和以和為貴的態度跟本土化的人際特性考量下的忍讓溝通特質，也是息息相關；此亦可從忍讓和迂迴兩者的相關達.378(接近中度相關)看出端倪。本量表不僅區分出Satir模式的討好，同時也彰顯了具華人文化底蘊的另一種忍讓的溝通樣貌。

指責護顏和人際互動量表(蔡金蓮，2009)的競爭相關為 .500。蔡版的競爭指的是以威權爭取自己的目標和權益，並且用忽略他人需要的方式來解決衝突。兩者的相關反映出，指責護顏的溝通蘊含著階層觀念下遂行己意和維護尊嚴的理所當然，在與人互動時，自然也較少考量他人的處境。

表6 溝通姿態量表之平均數和標準差及與效標關聯效度之相關分析

	討好	忍讓	指責 護顏	重理	証己	打岔	迂迴	一致	圓融
平均值	2.628	3.036	1.918	3.102	2.789	2.661	3.043	3.347	3.875
標準差	0.699	0.692	0.558	0.587	0.689	0.579	0.643	0.498	0.612
忍讓	.546**	.633**	-0.033	-0.108	0.006	.275**	.291**	-.230**	-0.013
競爭	0.045	-0.118	.500**	.149*	.387**	.184**	0.016	-.139*	-.241**
精確	0.001	-0.038	0.076	.522**	.573**	0.047	.156*	.284**	.184**
逃避	.188**	.156*	.339**	0.070	.142*	.406**	.358**	-.215**	-.277**
協調	-0.059	0.128	-.248**	.185**	0.101	0.007	0.044	.517**	.635**
自尊	-.296**	-.268**	-0.039	.237**	0.121	-.208**	-.204**	.405**	.182**

重理和証己二者與李佳倫(2003)溝通風格之測量中的精確性，相關分別為 .522和 .573。由於重理和証己都是從Satir模式的超理智延伸而出的溝通模式，此相關的意涵反映二者都有強調精確表達的特性，凡事講求證據，談話時要正確切入重點。然而，証己和蔡金蓮(2009)的競爭相關為 .387(接近中度相關)，此又顯示証己的溝通表現容易有忽略他人需要的傾向，也因此和重理的溝通有所差異。

打岔和人際互動量表(蔡金蓮，2009)的逃避相關為 .406。此中意義反映出心不在焉、消極抵制或隔離棄守的態度表現，在考量本土化的人際互動特性時，與採取退縮和被動的方式來解決衝突是有所關聯的。迂迴和逃避的相關為 .358，但與本量表忍讓的相關 .378結合來看，具華人文化的迂迴溝通看似有退縮、被動的意味，但其本懷和打岔仍略有不同。

一致和人際互動量表(蔡金蓮，2009)協調的相關為 .517，圓融和協調的相關為 .635。一致和圓融都具有協調的溝通特徵。此中反映出本土化人際特性的觀點下，越是忠於自我和顧及旁人的溝通風格，在面對衝突時，會傾向採取協商和折衷妥協的方式來解決。而越是圓融的溝通者，注重的是華人修養的實踐以及創造協商雙贏的可能，在內心穩定的基礎下，也越傾向採取協商和折衷妥協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此外，一致和洪瑞黛(2012)的自尊量表之相關為 .405。這現象切合Satir模式的理念，也就是具有一致特質的人，能在考量情境下顧及人我，其對自我全面性的

airiti

評價與感受較高。圓融雖與自尊的正相關達到顯著，其係數屬低度相關(吳明隆，2009)；此或許反映強調誠信與反求諸己的圓融，較無關乎如西方自我價值的感受。同樣地，討好、忍讓、指責護顏、打岔、迂迴與自尊雖為負相關，但其係數均屬吳明隆所界定的低度相關，實質意義不大。此或許呼應東西文化的差異，含攝華人文化的溝通不必然有強調個我自尊的機制，而是要考量其他如集體傾向(Markus, & Kitayama, 1991)或是關係的屬性。這部分有待未來進一步探討和檢驗。

從受試者在人際溝通的平均得分來看(見表6)，台灣民眾在「忍讓」、「重理」、「迂迴」、「一致」和「圓融」的得分是9個溝通姿態中高於中數3者；平均得分皆以「一致」和「圓融」為高，而指責的分數最低。與施測對象為大學生，同為探討一般人際溝通的研究(王嘉琪，2013；盧宜蔓，2009)作比較，其結果顯示：大學生多數傾向一致的溝通姿態，最少使用指責的溝通姿態。本研究與之類似，這多少反映出時下台灣民眾在人際溝通上的互動情況，傾向的是顧及關係、以理服人和據理力爭、忠於自我和顧及旁人、反求諸己和協商雙贏為考量重點。這或許和本研究的填答者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居多有關。未來可以檢驗不同背景特徵和人際溝通的關聯性。

(二) 驗證性因素分析

研究者進一步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量表的因素構念，結果如下所示。

1. 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模式之誤差變異皆為正值且達顯著；此外，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之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值結果如圖1所示(圖中數值為標準化估計值)，九個潛在構念分別包括4(討好)、4(忍讓)、7(指責)、3(重理)、3(證己)、3(打岔)、4(迂迴)、4(一致)、5(圓融)個測量題項，圖中最右邊的數值為誤差變異。整體因素負荷量介於 .55到 .92之間。此外，誤差變異介於 .30到 .84之間。整體而言，模式的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大致良好。

2. 整體模式適配度

整體模式適配度結果如表7所示。絕對適配度指標：RMR = .05、SRM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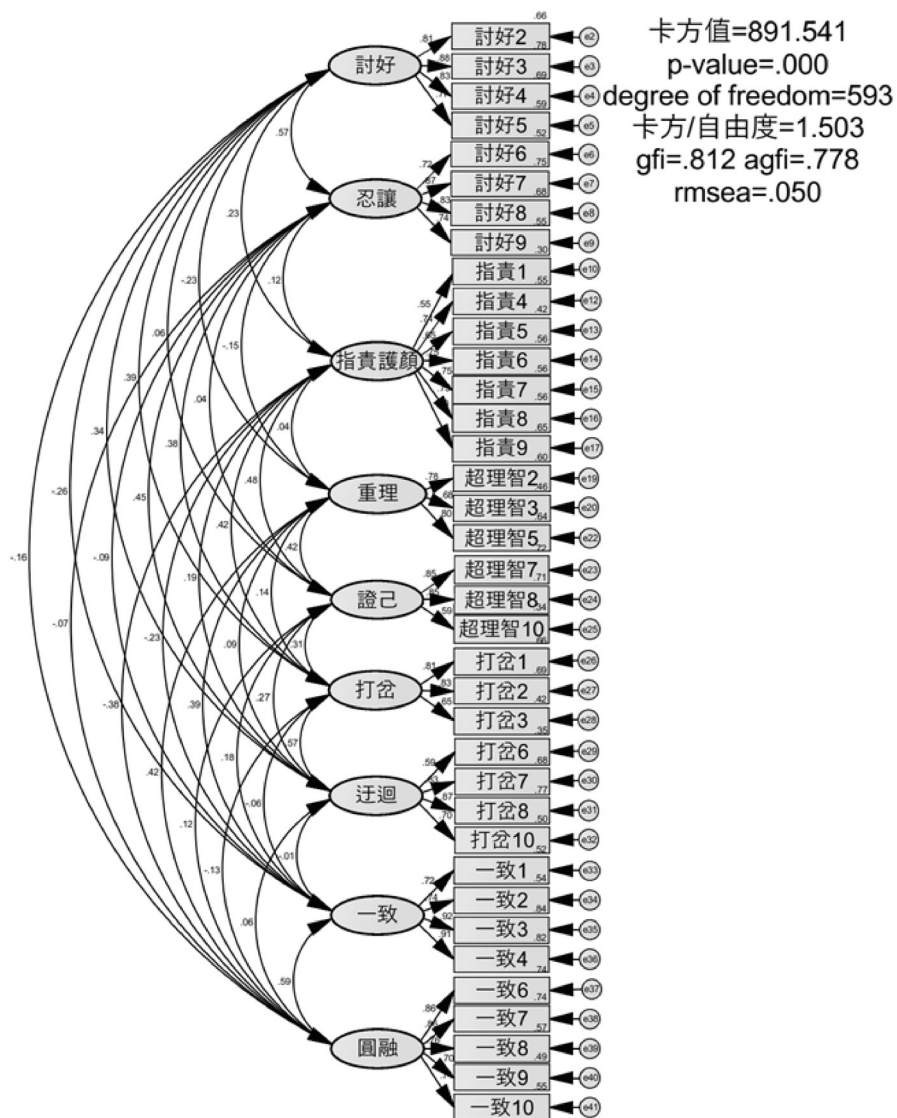


圖1 驗證性因素分析假設模型圖

.0653、RMSEA = .050；增量適配度指標：IFI = .929、TLI(NNFI)= .919、CFI = .928；精簡適配度指標：PGFI = .685、PNFI = .725、 $\chi^2/df = 1.503$ 。整體而言，模式的整體適配度大致仍符合合理適配標準建議。

表7 整體模式適配度

統計檢定量	評估項目	適配標準或臨界值	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RMR值	> .05	.050
	SRMR值	> .05	.0653
	RMSEA值	> .05(適配良好) > .08(適配合理)	.050
	NCP值	越小越好	298.541
增量適配指標	IFI值	> .90以上	.929
	TLI (NNFI)值	> .90以上	.919
	CFI值	> .90以上	.928
精簡適配指標	PGFI值	> .05以上	.685
	PNFI值	> .05以上	.725
	PCFI值	> .05以上	.826
	NC(X^2/df)值	1<NC<3	1.503

3. 內在結構適配度

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方面，以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來檢驗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組合信度是指測量指標變項一致性的程度；AVE是指潛在構念所解釋的變異量，有多少是來自測量誤差，若平均變異抽取量越大，被潛在變項構念解釋的變異量越大(吳明隆、張毓仁，2010)。

內在結構適配度結果中，個別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50，但理想狀態是 .70以上(吳明隆、張毓仁，2010)，除了指責1 (.30)、指責5 (.42)、超理智3 (.46)、超理智10 (.35)、打岔3 (.42)、打岔6 (.35)、打岔10 (.49)、一致9 (.49)外，其餘題項的潛在共同因素可解釋變異量皆符合大於.50的標準；潛在變項的AVE介於 .51至 .69之間，均符合 .50以上標準。最後，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介於 .80至 .90之間，也符合 .60以上標準(吳明隆、張毓仁，2010)。綜合上述結果可發現，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算是理想；顯示本研究所編製的人際溝通量表具有適切的信、效度。

airiti

總之，本研究的37題版和盧版(2009)，同樣都是將溝通姿態運用在一般人際關係，但本研究取樣包括全台廣泛的年齡層，並非只針對大學生。相較而言，本研究所修正之人際溝通量表題數大致平均，題目數也合理，同時更彰顯出符合台灣人溝通姿態的本土化特質。

四、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聚焦於20歲至68歲的台灣民眾，發展出一份可供華人探索和瞭解自身人際溝通特質的有效工具。在編擬量表的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人際溝通量表分為九種，溝通姿態名稱因其內涵而略有更動；分別為討好、忍讓、指責護顏、重理、證己、打岔、迂迴、一致、圓融。修訂之人際溝通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量表的建構始自研究者意圖於合乎自身文化的脈絡下，來理解溝通姿態的意涵，並從統計分析結果中，區分出忍讓、証己、迂迴、圓融等構念，以及擴充了指責為指責護顏的構念，更貼近華人文化的脈絡。就實務應用而言，本量表有助於台灣人了解自己在人際關係中習慣的表達方式，並明白其溝通姿態可能會帶來何種不同的互動結果，可謂值得應用與推廣的工具。本量表填答時間約在十分鐘之內可以完成。使用者可先以此量表供想要探討其人際溝通姿態的當事人填答；之後根據計分，說明其傾向，並做進一步的引導與探討。考量每個人可能不會總是使用單一溝通姿態，而是會根據當下情境、他人和自我的狀態做調整，因此可以了解填答者使用不同溝通姿態的程度。建議先瞭解填答者當時填答的狀態，並蒐集填答者對於目前人際溝通的描述，以利了解其溝通模式。

最後，仔細檢視研究過程，本研究仍有幾點限制需要未來加以改進，茲提出三點研究建議。其一，網路填答者的學歷和居住地分布不均，未來在量表問卷填答設計時，可以事先留意問卷訊息的發布管道，力求樣本的多元性。其二，考量個體在文化傳統性和現代性程度的不同，可能影響其人際溝通姿態的展現，未來可以納入此變項，進一步檢測。其三，人際溝通是雙方互動的結果，未來可據此量表，進一步納入雙方配對的分析和研究，如特定的人際關係如伴侶或夫妻關係，如此方能觀察溝通姿態與配對關係的動力現象。

參考文獻

- 王行(2016)。修身與齊家：以儒家心學為助人知識的家族治療。台北：心理。
- 王嘉琪(2013)。大學生家庭規則、溝通姿態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高雄市。
- 江麗美、魯宓譯(2006/2008)。薩提爾成長模式的應用(原作者：Banmen, J.)。台北：心靈工坊。
- 吳明隆(2009)。SPSS操作與應用：問卷統計分析實務。台北：五南。
- 吳明隆、張毓仁(2010)。結構方程模式實務應用秘笈。台北：五南。
- 吳峻安(2003年，9月)。試構中國人的溝通策略。「中華傳播學會2003年年會」發表之論文，新竹交通大學。
- 吳就君(譯)(1983/2006)。聯合家族治療(原作者：Satir, V.)。台北：張老師文化。
- 李佳倫(2003)。主管與員工認知、溝通風格之相似性對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的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台北市。
- 李瑞玲、黃繡、龔嫻紅(譯)(2000/2001)。薩提爾治療實錄：逐步示範與解析(原作者：Satir, V., & Baldwin, M.)。台北：張老師文化。
- 阮新邦(2008)。實證主義本土取向研究立場之剖析-兼評楊國樞及楊中芳的本土化研究觀。本土心理研究取徑論叢。台北：遠流。
- 卓紋君、簡文英(2003)。薩提爾模式親職成長團體對國中生家長輔導效果之研究。高雄師大學報，15，163-188。
- 易之新(譯)(2008/2009)。心靈的淬鍊—薩提爾家庭重塑的藝術(原作者：Gomori, M., & Adaskin, E.)。台北：張老師文化。
- 林沈明瑩、陳登義、楊蓓(譯)(1991/1998)。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原作者：Satir, V., Banmen, J., Gerber, J., & Gomori, M.)。台北：張老師文化。
- 洪瑞黛(2012)。醫療院所護理人員的共依附及其效果模式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彰化縣。

夏允中、劉淑慧、王智弘、孫頌賢(2018)。靈性與安身立命：從四大存有問題建構貫串靈性與生涯的本土化理論。**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1**，1-26。

張包意琴、陳麗雲(2000)。和諧中變革：易經與華人的心理輔導。**本土心理學研究**，**14**，199-235。

陳秉華(2001)。華人「人我關係協調」之諮商工作架構。**測驗與輔導**，**168**，3511-3515。

陳奕吟、卓紋君(2017)。夫妻原生家庭溝通姿態、婚姻溝通姿態、婚姻調適策略與婚姻滿意度之對偶分析。**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31**，7-51。doi:10.6308/JCPRC.201711_(31).0001

陳奕良(2001)。**薩提爾模式團體方案對青年情侶輔導效果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高雄市。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台北：心理。

黃光國(2010)。**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台北：洪葉。

黃光國(2017)。「自性」與「五常」：儒家文化中的倫理療癒。載於陳秉華(主編)，**多元文化諮商在台灣**(123-146頁)。新北市：心理。

黃曬莉(2006)。**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揚智文化。

黃曬莉(2008)。**科學渴望創意、創意需要科學：紮根理論在本土心理學中的運用與轉化**。**本土心理研究取徑論叢**。台北：遠流。

楊中芳(1999)。**人際關係與人際情感的構念化**。**本土心理學研究**，**12**，105-179。

楊東蓉譯(2008/2019)。**當我遇見一個人：薩提爾精選集1963-1983**(原作者：Banmen, J.)。台北：心靈工坊。

楊國樞(1993a)。**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1**，6-88。

楊國樞(1993b)。**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一九九二)(87-131頁)。台北：桂冠。

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11-80。

airiti

楊國樞(2008)。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本土心理研究取徑論叢。台北：遠流。

葉光輝(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32，101-148。

劉惠琴(2005)。親子關係中“多元個體化”歷程的內涵與測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8(4)，55-92。

蔡金蓮(2009)。高中職學生家庭系統分化、自我概念與人際衝突解決策略之關係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南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台南市。

盧宜蔓(2009)。大學生的溝通姿態、自尊與人際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高雄市。

顏欣怡、卓紋君(2013)。大學生情侶之愛情風格、溝通姿態、關係滿意度及關係承諾度之探討－對偶分析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3)，443-485。

Banmen, J. (2002). The Satir model: Yesterday and today.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1), 7-22.

Banmen, J., & Maki-Banmen, K. (2014). What has become of Virginia Satir's therapy model since she left us in 1988?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therapy*, 25(2), 117-131. doi: 10.1080/08975353.2014.909706

Bozeman, J. C. (1985). An investigation of Virginia Satir's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to determine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in marital communic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 , 46(3), 663.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AAC85-09627)

Brindley, T. A. (1990).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I).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XIV, 1-16.

Chao, W. (2011).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family therapy develop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3(4), 415-428. doi: 10.1111/j.1467-6427.2011.00550.x

Cheung, G., & Chan, C. (2002). The Satir mode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A Hong Kong reflection.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4, 199-215.

Gao, Ge (1998).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ace and concern for “other”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2(4), 467-482.

- Innes, M. (2002). Satir's therapeutically oriented educational process: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1), 35-36.
- Lau, W. K. W., Leung, P. P. Y., & Chung, C. L. P. (2019). Effects of the Satir model on mental health: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9(7), 775-785. doi: 10.1177/1049731518819829
- Lee, B. K. (2002a). Development of a congruence scale based on the Satir model.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4(1), 217-239. doi: 10.1023/A:1014390009534
- Lee, B. K. (2002b). Congruence in Satir's model: Its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1), 57-78.
- Lu, L., & Yang, K. S. (2006). Emerg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modern bicultural self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3), 167-175.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Norton, R. W. (1978). Foundation of a communication style construct. *Huma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2, 99-112.
- Norton, R. W. (1983). *Communicator style: Theory, application, and measure*. Beverly Hills: Sage, Beverly Hills.
-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 Rosenberg, M., Schooler, C., Schoenbach, C., & Rosenberg, R. (1995).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141-156.
- Satir, V. (1983).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Palo Alto, CA: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 Smith, S. (2002). Transformations in therapeutic practice.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1), 111-128.
- Tam, E. P. C. (2006). Satir model of family therapy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Pastoral Psychology*, 54(3), 275-287. doi: 10.1007/s11089-006-6327-6

A Reflection Upon Satir's Communication Stances and Revis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aiwanese People

HSIN-YI YEN, WEN-CHUN CHO

Purposes: Satir's five communication stances (Satir, 1983) are commonly used in counseling practice in Taiwan along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tance scal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and reflect on the communication styles of Taiwanese citizens, who have a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western-influenced society. We revised and tested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tance scale to make more appropriate for use in Taiwan. **Methods:** A total of 413 Taiwanese participants over 20 years old completed valid online surveys. **Results:** According to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es with varimax rotation)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9 factors were extracted: placating, tolerating, blaming and saving face, super-reasonable, self-proving, irrelevant, roundabout, consistent, and harmonious. These factors explained 65.074% of the total variation, the full scale had a Cronbach's α of .806. This revised scale has good criterion-relevant validity, and most of the indices as a result of CFA showed a goodness of fit. **Conclusions:** The revised communication stance scale possessed satisfactory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t can be used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Taiwanes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general. In other words, Satir's five communication stance scales cannot represent Chinese communication. Eight out of nine communication styles, except for blaming and saving face, has dual-characters in that these styles encompass congruent and incongruent communications with a particular Chinese culture essence.

Key words: Satir model, communication stance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cale

Hsin-Yi Yen: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Dr. Lin's Healing Clinic.

Wen-Chun Cho: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ccho@nkn.edu.tw)